

高教动态

2026 年第 5 期

杭州师范大学发规处（学科办）编

2026 年 6 月 30 日

目 录

【政策导向】

-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明确教育强国建设路径 1
- ◆高等研究院工作推进会召开，支持中西部地区建设高等研究院 2

【新闻短讯】

- ◆浙江率先启动省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101 计划” 3
- ◆2026 年 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发布 5

【高教动态】

- ◆第三轮“双一流”前瞻洞察：非“双一流”高校冲刺实力与策略分析 6

【他山之石】

- ◆复旦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形成“5+15+100”战略牵引体系 8

【理论研究】

- ◆瞿振元：学科专业设置的优化调整与质量提升再认识 11
- ◆管培俊：师范教育并未进入“减量时代” 21

【常春藤高校】

- ◆竺可桢对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引进与改造 25

【政策导向】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明确教育强国建设路径

国务院总理李强 6 月 1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 2025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及时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深化评价机制改革，发挥协同育才引才聚才作用，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强化投入

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健全保障体系，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加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深化隐患排查整治，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

（教育部，2026.6）

◆高等研究院工作推进会召开，支持中西部地区建设高等研究院

6月17日，高等研究院工作推进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高等研究院实质性落地、高质量建设、高效能运行，更好支撑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开辟区域发展新赛道。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出席推进会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面向中西部和边疆地区建设高等研究院，是以区域特色资源禀赋为牵引，汇聚区域内外优势高校、优质头部企业打造的区域创新策源地、人才集聚高地和产业赋能平台。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布局高等研究院的重大战略意义，加快推动高研院建设，着力促进高水平高校、优势学科与重点

行业和头部企业强强联合，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转移为一体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新样本。

会议强调，当前高等研究院建设处于从破题开局全面转向实质性落地的关键节点，要明确目标导向，聚焦增强战略牵引作用、提升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做到机制、资源、评价围着目标转。要跳出固有思维和传统路径依赖，以机制创新激活禀赋优势，强化有效的有组织科研，注重建制化跨学科协同创新，推进系统性赋能，重塑产学研用链条，构建创新生态。要构建政府所需、产业所为、大学所能三方协同联动的有效机制，建实由龙头企业、“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当地高校组成的联合创新体，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出题、共同攻关，实现区域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双自主”。要聚焦服务区域发展、服务周边“双高峰”的战略定位，聚焦主导产业，探索未来产业，支撑区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保障高等研究院建设有序推进。要汇聚建设合力，坚持“硬投入”与“软建设”相结合，持续深化政产学研深度协同。要制定建设指导标准，加强考核评估，强化闭环管理。要锤炼务实作风，坚持试点先行、典型引路，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确保高研院始终保持活力和竞争力。

（教育部，2026.6）

【新闻短讯】

◆浙江率先启动省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101计划”

近日，浙江省高校计算机及人工智能本科教学改革试点“101计划”启动会在温州举行。会议发布44项教学改革任务清单并公布首批87门核心课程培育名单。这标志着浙江在全

国率先启动省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101计划”。

“101”源于美国大学课程编号中代表“入门必修课”的传统，寓意从最基础、最核心的课程与教材入手，系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2021年底，教育部在计算机、基础学科及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本科教学改革试点工程“101计划”。浙江此次启动的正是该计划的地方化拓展与创新。

省高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类专业教指委主任委员、浙江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吴飞介绍，浙江的“101计划”核心课程建设聚焦四个领域。具体来说，浙江在教育部计算机“101计划”的12门本地化应用课程基础上，增加了6门国产软硬件系统特色课程、5门智能计算等行业领域特色课程，以及21门“人工智能+X”交叉创新特色课程。每门课程均要求配套教材、实践项目及师资团队，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中心及龙头企业资源，将产业界“真问题、真场景、真数据”融入教学。

浙江的“101计划”采取“揭榜挂帅”的方式。首批立项的87个培育项目将于2027年底验收认定，并建立年度动态调整机制。同时，浙江成立“101计划”产教融合创新实践联盟，汇聚腾讯、阿里、华为、百度、科大讯飞等企业力量，与高校共建产教融合生态。

“‘101计划’最初主要面向一部分名校。”教育部“101计划”推动人、图灵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表示，浙江把目光投向了更广泛的学生群体，这些学生恰恰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地方产业的主力军，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

浙江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教育与AI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国家战略和时代命题。浙江率先启动省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101计划”，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样板，下一步将结合地方产业需求和高校条件，抓紧遴选、推进其他学科的“101计划”。

（浙江日报，2026.6）

◆2026 年 U. 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发布

2026 年 6 月 16 日，2026-2027 年度 U. S. News 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完整榜单发布。榜单头部席位被欧美老牌名校牢牢占据，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分列全球前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紧随其后守住前五席位，美国、英国顶尖院校依旧保持强劲综合竞争力。

在这份全球权威榜单中，中国内地与香港高校集体交出亮眼答卷，整体排名普遍上行，顶尖梯队规模持续扩大，展现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果。

在 2026-2027 年度 U. S. News 全球大学排名中，共有 16 所中国高校进入全球前 100，其中内地高校 11 所、香港高校 5 所。内地 11 所上榜高校包含 8 所 C9 高校，整体排名呈普遍上涨态势：清华大学由去年全球第 11 位升至第 6 名，成功闯入全球前十，创下内地高校在该榜单的历史最高位次，顶尖办学实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北京大学从第 25 名上升至第 19 位，携手清华站稳全球前二十，代表国内高校最高综合办学水平。

除此之外，进去全球百强的内地院校还有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其中复旦大学提升 21 个位次至全球 49 名，是所有上榜中国高校里进步幅度最大的院校，中科大、国科大、南大、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名次均有所上涨，仅华中科技大学小幅下滑 1 位，但小幅波动并未动摇其全球百强的席位。作为 C9 高校，哈工大、西交大尚未进入 2026-2027 U. S. News 全球前 100 高校序列。

我校 2026 年 U. 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国际排名 605，国内排名第 85 位，省内高校位列第 5。

(U. S. News, 2026. 6)

【高教动态】

◆第三轮“双一流”前瞻洞察：非“双一流”高校冲刺实力与策略分析

日前，人民日报发布的相关消息显示，2026 年，第三轮双一流高校建设已经全面启动。

按照前 2 轮双一流评选时间进度进行推算，最早到 2027 年初，教育部门可能就会向社会公布入选高校名单。

因此对于 2026 年参考高考的同学而言，是有机会提前捡漏一个双一流高校的。

今天升哥就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当前最可能入选第三轮双一流的 12 所双非高校，如果咱们家里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可以好好看看这篇文章，高考结束后志愿填报时可以做个参考。

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一起来看：

首先是有国家政策支持且综合实力已经全面达标的 7 所双非高校。

分别为山东农业大学、燕山大学、陆军军医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江西农业大学。

这 7 所双非高校都是位于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教育部此前已经明确说过：2026 年将推动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区倾斜。

基于这一点，第三轮双一流评选中这部分高校极有可能是重点，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具体来看的话，山东农业大学的优势学科为作物学，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为 A-，有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近 5 年拿下了 2 项国家级大奖，相关学科领域内没有什么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基本能确定可以入选第三轮双一流。

燕山大学和陆军军医大学的实力也非常强，第三轮双一流竞选中，两校优势学科评估结果都达到了 A-，且都有全国重点

实验室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入选概率极高。

江西财经大学则属于是第三轮双一流竞选中文科高校的佼佼者，学校的优势学科为统计学，学科评估结果为 A-，是教育部 101 计划参与高校，还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和教育人文社科一等奖，这两个含金量都非常高，前者为人文社科领域最高科研平台，后者是人文社科领域最高科研奖项，在这些加持下，学校的入选概率至少是在 90% 以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建筑老八校之一，在很多人眼中，学校的优势学科建筑学如今已经没有入选的必要，但事实上，西建大建筑学是对接有国家重大战略的，且各项指标均已达标，未必不能入选。

昆明理工大学和江西农业大学目前来看略有不足，但整体上是达标的，若 2026 年两校分别能在全中国重点实验室和学科评估结果方面做出一些突破，入选概率可能会更大一点。

而除了以上 7 所双非高校，东部地区也有 5 所双非高校相关指标已经全面达标。

分别为浙江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深圳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

其中浙江工业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这 2 所高校的优势学科都是化学工程与技术，也都有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家三大奖，最终的评选中，2 校肯定会形成直接竞争。

首都医科大学的优势学科为临床医学，学科评估结果是 A，位列全国前列，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近 5 年国家级大奖方面有缺失，不过在 2025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初评中，学校表现极其优异，拿下一个国家级大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深圳大学在很多大学排行榜中一直是双非高校前几的存在，学校竞选第三轮双一流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 A 类学科，在国家级大平台和国家级大奖方面，深圳大学不输任何高校。

福建师范大学拥有 3 个 A 类学科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是所有师范类双非高校中排名第一的存在，若是第三轮

双一流师范类还有名额，必然会是福师大。

总的来说，这5所双非高校的实力也是不差的，只是没有国家重点支持，加上所在地区双一流高校数量众多，增选难度可能更大一点。

（网易，2026.6）

【他山之石】

◆复旦大学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形成“5+15+100”战略牵引体系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为“第一个复旦”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一年后的5月26日，建校121周年之际，复旦大学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光华楼举行。

大会全面回顾一年来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的工作进展，系统总结“十五五”规划编制“三下三上”校院联动大研讨成果，举行《“十五五”改革发展任务书》党政“双签约”，对学校“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动员全校上下牢记嘱托、挺膺担当，走好“第一个复旦”建设新征程。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为“第一个复旦”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一年后的5月26日，建校121周年之际，复旦大学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光华楼举行。

大会全面回顾一年来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的工作进展，系统总结“十五五”规划编制“三下三上”校院联动大研讨成果，举行《“十五五”改革发展任务书》党政“双签约”，对学校“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动员全校上下牢记嘱托、挺膺担当，走好“第一个复旦”建设新征程。

校党委书记裘新、校长金力发表讲话，校党委副书记钱海红主持大会。学校党政领导班子，上海医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二级院系、实体研究机构、实体运行科研机构、附属医院党政负责人，地方研究院负责人，新型研发机构代表负责人，重点方向牵头单位、参与单位党政负责人、校关工委成员、教代会代表等出席。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苏长和教授、高分子科学系孙雪梅教授、现代物理研究所许敏教授、附属华山医院毛颖教授作为重点方向牵头单位代表发言。

“本月，我们举行‘1+N’121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其中，‘1’就是今天的‘双签约’仪式。这是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最重要的标志性举措，是一次郑重的政治宣示。”裘新强调，“双签约”签下的是服务强国建设的政治责任，立下的是校院同向发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办学军令，承载的是全体师生员工敢打头阵、勇当尖兵的使命担当。

通过“双签约”，学校正式把“5+15+100”战略体系细化为各二级单位清晰可行的战术路径，确保顶层设计不踏空、能落地。从学习到转化、部署到签约，校院两级通过编制《“十五五”改革发展任务书》，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要求转化为发展目标、殷切嘱托转化为重大任务、顶层指引转化为具体举措，交出了一份对标对表、善作善成的周年答卷。

裘新指出，要把高质量发展的“施工图”化为“实景图”，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明确“要什么干什么”，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实现“干什么成什么”，不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引导校内各单位把中心工作转移到落实任务书上来，打破惯性思维，处理好重点方向和日常工作间的关系。要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既找准现有学科转型升级的发力点，也前瞻布局一批前沿原创引领的结构性增量，确保复旦学科建设始终保持面向未来的适应性和竞争力。要向融合创新要动力，破除阻碍资源流动、限制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壁垒，让不同单位、不同学科的创新资源真正

汇集到重点方向上。

“双签约”完成后，学校将推出四个包全力保障任务书落地。“资源包”向重点方向倾斜，优先保障人、财、物；“政策包”解决基层反映集中的堵点难点，打通干事创业的通路；“考核包”发挥指挥棒作用，把重点方向任务推进成效作为重中之重，建立健全考核结果与资源投入、绩效奖励和干部使用挂钩机制；“组织包”通过落实干部任期交接、能上能下等制度，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十五五”期间，复旦大学将致力于把每个二级单位打造成为“动车”，推动创新型大学“动车组”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跑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为了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去年9月以来，学校组织开展“三下三上”大研讨，坚持办学目标、战略需求、改革任务、资源拓展“四个牵引”，全面梳理问题、凝聚发展共识、校准前进方向，把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 and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和学校“十五五”顶层设计上来，形成了“战略任务驱动、校院协同联动、综合改革带动、资源配置撬动”的“动车组”动能体系。

金力介绍，学校以“四个面向”为基本方位，以服务国家为使命引领，将宏观布局具体化为5大战略导向、15个战略领域和99+X个重点方向，形成“5+15+100”战略牵引体系——战略导向对接国家所需、未来所向与复旦所长，彰显学校服务强国建设的使命担当；战略领域强化导向作用，推动各二级单位在全校布局中找准定位、明确主攻方向；重点方向突出目标牵引、任务抓手，鼓励开展交叉协作、融合创新。

“‘双签约’不是句号，而是冒号。它标志着校院两级责任共担、目标同向、行动同步的契约关系正式确立。”金力强调，要以“双签约”为新起点，跑出校院一体的“动车组”加速度。要统筹兼顾目标任务，职能部门做好“统”的窗口调度，二级单位做好“分”的协同落地；要优化资源配置筹措，推动

资源向二级单位倾斜、向重点方向倾斜、向实绩贡献倾斜；要用好用足政策工具，加大政策供给、释放制度红利，面向重点方向精准匹配、分类施策、动态迭代；要进一步转化深化任务书内容，做好“十五五”总规和专规编制工作。

“双签约”开启了学校迈向“第三个甲子”、奋进“十五五”的新篇章。新起点上，复旦大学将始终把一丝不苟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第一标尺”，坚持发扬“四个一切”工作作风，确保校院“动车组”动能充沛、步调一致、全速前进，加快迈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作出新贡献。

（复旦大学，2026.6）

【理论研究】

◆瞿振元：学科专业设置的优化调整与质量提升再认识

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于2025年8月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进入系统部署、全面推进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设置,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方案》的出台,正是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的关键举措。该方案的显著特点是:一手抓“重大行动”突破,一手抓“长效机制”建设,力求既有效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又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学科是大学发展的根基。办什么样的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基础都在学科。学科的水平 and 特色,从根本上决定了大学的实力和优势,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学

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小事”，而是事关高等教育发展全局的“大事”，直接影响大学的整体进步和长远发展。在推进这项工作时，我们既需要满腔热情、积极进取，又需要头脑冷静、稳慎操作，从思维、历史、实践、主体四个方面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以下若干问题。

一、学科、专业的内涵以及内在关系

什么是学科？什么是专业？两者关系如何？这是做好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需要首先明晰的基本认知问题。

学科是知识的体系化划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进行系统化、专业化分类的结果。换言之，学科是将人类长期积累的知识，按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划分成的不同领域（如数学、物理学、文学、历史学等）。每个学科领域既包含理论知识体系，也包含相应的研究范式、方法与实际应用。学科亦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化和知识总量的增长而不断演进，既有新学科的“创生”，亦有旧学科的“消亡”。因此，学科的动态调整乃常态。

为了开展学术研究、推进知识发展，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学科领域内活动并结成相应关系，从而形成学科组织。这种组织既是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的力量载体，也构成了特定的利益群体。进行学科建设时，既要关注“物”（包括知识）的关系的同时，也必须高度关注“人”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避免陷入“见物不见人”的建设误区。

至于通常所讲的“专业”或者本专科教育中的“专业”，首先需要深刻认识其社会属性：专业在本质上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社会生产、生活、服务的发展催生了分工，进而出现了需要特定知识与技能才能胜任的专门职业（如医生、工程师、教师、律师等）。高等教育中的专业，是为培养能够适应社会专门职业领域需求的人才而形成的概念，而非单纯的教育或学科概念。这也正是专业区别于学科最关键的底层逻辑。高校依托相

关学科知识，设计出对应的专业，以培养满足专门职业需要的人才。因此，专业从诞生之日起，便带有浓重的社会属性。可以说，专业是社会职业需求在高等教育中的直接映射。综上所述：①专业的“专业性”根源于职业的“专门性”；②专业设置随社会分工的变化而动态调整；③专业的培养目标始终聚焦于特定的专门职业领域；④专业的内容也是一种知识体系——一种源于多个学科知识有机组合而成的综合性知识体系。

需特别指出的是，研究生教育中所说的“专业”与本专科教育中的“专业”含义不尽相同。在研究生培养以及学位授予目录中的“学科专业”，其中的“专业”特指实践型研究生的培养类别。专业学位源自英文的“Professional Degree”，是与学术学位相对应、侧重于培养职业实践能力的一种学位类型。

综上所述，学科与专业既各有侧重，又在一定的逻辑内核上存在交叉。在谈到“专业”一词时，需要辨析其所处的场景及相应的语义内涵。

二、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的变迁历程

厘清学科专业设置的“来龙去脉”及现实问题，是做好调整优化工作的基础。我国规范的学科专业目录，是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研究生教育的恢复与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高校主要开展本专科教育教学，科研活动较少，研究生教育规模有限。即使有研究生教育，也大多属于不授予学位的阶段。彼时，高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范畴是“专业”。学校按专业进行招生和培养，学生按专业进行学习和就业。相近的专业组成系(学系)，教学组织、行政机构和党的基层组织，均以专业为中心而建立。可见，当时“学科”的概念尚未成为高等教育实践的核心范畴。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方毅等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后做出重要指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这一重要指示突破了教育与科研长期分割的体制藩篱，明确了高校的科研职能，推

动高校逐步发展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大学。

自此，我国高校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相关工作推进势如破竹。1978年，高校恢复招收研究生。1979年国务院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起草工作；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该条例；1981年，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首次对学科进行具有法规性意义的分类。随后，教育部拟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草案)(征求意见稿)》，据此目录审核批准了我国第一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并于1982年起按此目录招收研究生。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公布并试行《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从此，我国高等教育正式拥有了规范的学科分类体系。

此后，为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在1983年方案的基础上，我国又于1990年、1997年、2011年和2022年对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四次系统调整，目前共设14个学科门类、117个一级学科、67个专业学位类别。纵观这一历程，自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建立以来，学科分类的基本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同时根据知识发展与外部需求的变化，总体以增量调整为主，对局部进行了持续优化。

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稳步调整的同时，本科专业目录则经历了先膨胀后压缩的比较大幅度调整。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学习苏联模式，按照计划经济的思想划分专业，将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口并且划分很细。在特殊时期，专业设置曾一度陷入盲目与无序的状态。1980年，我国本科专业种类多达1039种。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教育改革迅速展开。随着教育思想的转变和教育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界开始日益强调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重视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和适应性，并采取

了减少专业种类、拓宽专业口径、引导面向市场就业等措施。在此背景下,本科专业历经多次调整,专业数量逐步减少。1987年,专业种数由原有的1343种精简至671种;1993年进一步调整为504种;1998年则大幅缩减至249种。显而易见,专业设置的调整和专业数量的增减,深刻折射出我国高等教育思想理念的变革轨迹。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和普及化程度的稳步提高,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持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产业逐步形成。为适应这一变化,教育部在专业目录原有专业之外,陆续批准设置了一些“目录外专业”,促使本科专业数量逐渐增加。据教育部历年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统计,2020—2024年间,增设数量最多的五个专业依次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和智能建造,撤销数量最多的五个专业依次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市场营销和产品设计。截至2024年,我国普通本科专业数量达到816个,分属12个学科门类。相较于本科教育,专科(高职)教育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突出职业性和技能性,其专业设置更强调与职业领域和岗位群的指向性。目前,高职专业共设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34个专业。

综上所述,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建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调整优化绝非“随心所欲”之举,而是一项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目的性的系统工程。每一次调整变化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思想。

从根本上说,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核心命题,在于解决学科专业建设与社会需要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问题。由于学科专业建设总体上与社会需要相适应,因此需要保持其基本延续性,无须推倒重来;又由于其在某些方面与社会需要尚不适应,因此需要持续改革、动态优化。我们关注的重点,应当聚焦于如何有效解决学科专业建设与社会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

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探寻破解之道。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审视，我国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首先，学科专业设置规范性较强而灵活性相对不足。这与中国学科专业体系后发建构的发展路径直接相关。在建立学科专业目录之初，强调规范性主要是为了扭转此前认识不一致、行为不规范的混乱局面。这种强化规范的路径，使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作为后发国家，我国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先行现代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后者经过相当长时间才逐步形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过程；相应地，其学科专业目录也比较柔性，甚至仅具统计性。这种宽松的学科专业设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科专业的发展。当前，在已经建立完备的学科专业体系的基础上，我们应当研究如何促进规范性、指导性以及统计性有机结合，使学科专业设置既规范又灵活，更加有利于学科专业的发展。

其次，管理方式刚性较强而柔性不足。现行管理工作行政指令性与规定性较强，高校自主决策空间有限，尚未从根本上跳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作为办学主体，是兼具非营利公益法人属性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属性的独立法人，同时享有独立民事主体资格和行政主体资格。因此，在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过程中，应确立高校的主体地位，赋予其更大自主权，使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和学校自主三者有机结合。

第三，学科专业内涵更新滞后，对学术前沿和社会发展前沿的反映不足。当今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产业日新月异，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我国社会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然而，学科实践未能及时回应这种快速而深刻的变革，成为学科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正如歌德所言：“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学科的内容应当随着实践不断发展，保持生机活力。

当然，在此方面，教学和科研的要求不能混同。科研应当更加活跃，不仅应满足实践，更应引领实践；教学的内容虽要尽可能反映前沿，但更要注意给予学生生命周期更长的知识，并培养学生不断获取甚至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三、知识体系与工作体系的辩证关系

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逻辑植根于实践，因此必须明确知识体系与工作体系的区别与联系。学科是知识体系的分类，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往往是综合性的，需多学科知识汇聚方能解决。依靠单一学科知识解决的“问题”仅占少数，大量现实“问题”的解决依赖多学科知识。

现实生活直接面对的是“问题”而非学科。究其根本，知识本质上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一方面，知识的内容源于客观事物的特征与联系，其客观性来自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另一方面，知识并非客观事物本身，而是经过人脑加工后的主观表征，难免受人的认知能力影响。此外，我们所说的学科体系只是知识体系的理想化划分。

事实上，我们始终处于工作体系之中，真实的工作情境是无边界的复杂问题场域。知识体系及其理想化划分的学科体系，与真实的工作体系自始便存在差异与矛盾。学科体系的划分旨在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知识纵深发展，但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边界和壁垒。例如，机械工程专注于结构设计，电子工程专注于电路开发，软件工程专注于代码实现，但一个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却需要三者的深度协同。

真实工作的复杂性在于，现实的问题往往是综合的、混沌的，无法用单一学科知识解决。以常见的大气污染治理为例：既需要化学、物理等学科知识解析污染物的生成、扩散、反应机制，为源头防控提供理论依据，并支撑除尘、废气净化等工程技术的原理设计；又需要生物学知识阐释植物吸附、微生物降解等自然净化机理；还需大气科学知识研究大气运动规律、模拟污染物扩散路径，为区域联防联控提供气象数据支撑。此

外，法学为治理提供制度保障；经济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设计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机制提升治理效率；公共卫生学则聚焦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为治理目标设定提供健康维度的参考；计算机科学则通过大数据建模、人工智能预测，辅助实现大气污染的精准预警与动态管控。可见，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知识的汇聚与融合；而卓越的科学家也往往具备跨学科的知识素养。实际上，集成电路、高铁、大飞机、航天工程等等，都是如此。

显然，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与工作体系的差异和矛盾，直接影响到学科专业的设置调整和优化。我们绝不能脱离工作体系(现实工作)的需要空谈学科建设和发展，否则无异于关门建设学科、脱离实际发展学科，是没有出路的。学科建设既要立足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又要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交叉融合。但是也不能离开已有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开展现实工作，更不能甩开已有学科体系，转而强调当前工作的重要性另建立一套“学科体系”。

其一，厘清知识体系和工作体系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上项目”和“建学科”之间的辩证关系。现实工作中的大量问题属于工作体系的内容，应当通过“上项目”予以解决，而非建“项目学科”或“产品学科”。解决“项目”问题，需要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汇聚各学科专业人才协同攻关。高校应着力培养多学科专业人才，以不同学科专业、规格层次的毕业生精准对接人才市场需求；用人单位在人才市场寻找适合“项目”需要、能解决“项目”问题的人才。因此，高校毕业生供给与用人单位的“供需适配”，已超越了传统观念中的“专业对口”。

其二，厘清知识体系与工作体系的区别和联系，还有助于深入认识“学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与“急需学科专业清单”(以下简称“清单”)之间的关系。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

法》，并首次研究制定《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及其管理办法。在长期沿用目录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增设清单，构建起“目录+清单”的学科专业建设管理新模式，标志着管理理念的显著进步。这一举措，既保持了原有学科专业目录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又使得学科专业设置具有灵活性和易变性，从而更敏捷响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然而，这也引发了目录和清单是何关系的争论。部分研究提出“目录与清单并重、互为补充”，以显示对清单的重视和对上级指示积极回应的态度；另一些研究不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应当“目录为主、清单补充”，既坚持学科分类的科学性，又推动对现实问题的快速响应。

基于对知识体系和工作体系关系的认知，可以确立如下原则：对于工作体系中提出的现实问题，凡是能够在原有学科专业目录框架内解决的，无须列入清单或采取其他临时性措施，应作为“特定项目”，依托现行学科专业目录予以解决。此举既迅速解决现实问题，又推动原有知识体系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激活和发展。而急需学科专业清单作为补充工具，专门用于应对学科专业目录未能涵盖的新兴交叉学科或短期性、项目性急需问题。例如，202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超常布局了24个低空技术学科相关的学位授予点。对于社会急需发展但尚未在学科目录中有所体现的领域，清单将有助于灵活应对市场与技术变化的需求，主要发挥应急响应作用。此类清单不应固化为常规目录的一部分，而应定位为“特定项目”，待问题解决了，项目即行终止，相关的知识或将融入既有学科领域，或进一步发展新学科并纳入学科专业目录。由此在目录与清单之间构建良好的协调机制：学科专业目录是学科设置的主线，清单则是针对新兴领域等特殊需求的重要补充。

四、行动主体与规制体系的协同联动

高效的行动主体和有序的规制体系，是推动落实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的关键。当前，国家已经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方案》，完成

了调整优化的顶层设计；首次建立了横跨 14 个部门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工作组，强化了国家层面的战略统筹；创新构建了学位授予点超常规布局机制，提升了对战略急需领域的快速响应能力。可以说，国家层面上已经对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做出了周密部署。然而，要真正落实到基层，还需要进一步健全中央宏观调控、省级区域统筹和高校自主办学的治理体系和协同机制，压实省级统筹责任和高校主体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责任主体涵盖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省级主管单位和高校自身，三者应形成联动协同的工作模式，打造从宏观决策到微观落实的完整闭环。

国家层面聚焦宏观调控与方针政策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依据这一法定职责，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教育部、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统筹制定学科专业调整的总体目标、目录管理机制和激励政策，并且协调行业部门共同明确国家战略需要的引导方向。

省级层面聚焦区域统筹与资源配置。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发挥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对省级学科专业布局进行规划，调控区域高校学科布局的差异化与特色化发展。尤为关键的是，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中，“确立以省级管理为主”的原则。对大国办大教育而言，落实这一原则至关重要。省级“为主”的作用发挥好了，学科专业设置就会更加适应各方面的需要、真正得到优化，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会更加紧密。

高校是学科专业调整的执行主体。要根据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市场需求以及人才培养规律，科学制定本校学科专业设置和发展规划，通过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布点、建立内部质量保

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学科专业的自主更新与特色发展。

学科专业调整既需要战略眼光，又需要稳慎操作。这不仅是学科专业点的增减，更涉及办学理念、管理机制等深层变革；既关乎教师和学生的切身利益，更牵动校园和谐稳定大局。

就学生群体而言，调整的核心在于如何更好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在这方面，只要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更加灵活的制度去处理，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对教师队伍而言，影响则更为深刻。①对教师职业生涯的直接冲击。一些教师在专业撤销后面临转岗；一些教师在学科平台撤销后职业上升空间被挤压；一些教师可能面临失业风险，如小语种等专业教师在停招撤销后产生种种忧虑。②教师能力升级更加紧迫。人工智能要求教师重构知识体系；教育教学技能面临转型挑战，一些教师需要从单一授课者转变为产学研协同组织者。③教师心理与身份认同面临某种危机。部分教师出现职业认同焦虑，甚至产生“中年失业恐惧”，尤其是缺乏跨领域技能的专业教师，对未来职业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感到忧虑乃至恐惧。上述问题，均是学校在推进改革中需要妥善处理的。

（中国教育在线，2026.6）

◆管培俊：师范教育并未进入“减量时代”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振兴教师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进入一个新的“窗口期”。有智库预言“师范教育进入‘减量时代’”，这种推论为时过早。20年前就有所谓专家不断预测“教师过剩”，盖因脱离教育实际，从线性思维、单纯数据、表面现象出发。如果教育决策与社会舆论基于这样的信息，教师教育“十五五”规划的决策就难免战略失误，必要的教师培养规模与师范院校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本就存在的教师资源“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会进一步加剧，教师资源

有效配置与优化就会支持乏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关于“优化教师管理和资源配置。优化各级各类学校师生配比，统筹做好寄宿制学校、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配备”的要求就难以落地见效。

毋庸置疑，人口趋势与学龄人口结构将深刻影响教育的方方面面。新生人口下降导致学龄人口减少，确实会直接影响教师的需求与供给，师范教育系统也将产生连锁反应。但影响教师教育的因素十分复杂，全面把握、准确研判教师的需求与供给关系，对于师范院校确定培养规模、调整人才培养方向与模式，对于加强与优化教师资源配置至关重要。因此，确定教师教育发展战略需要系统思维，需要科学研判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以全面、动态、发展的眼光分析教师需求与供给，充分考虑相关复杂因素。不仅要看“减量”因素，还要看到“增量”因素；不仅要看“当前”因素，还要看到“未来”因素；不仅要看“更加公平”的因素，还要看到“更高质量”的因素；不仅要看“规模数量”的因素，还要看到“结构性”与“质量水平”的因素，方能得出完整准确的结论。

首先，预测教师需求和培养规模，要有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教师的需求供给随学龄人口规模变化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学龄人口变化是递进式的，国家人口激励政策可预期效应显现也有一个过程。分析我国学龄人口结构与变化趋势，受生育率持续下降影响，全国学龄人口规模预期的确相应缩减。同时要看到，各学段人口规模的峰谷呈梯次转移。生育政策调整后还会形成新的入学高峰，并随学制层级梯次传导，学龄人口变化在学段间呈现“波峰迁移”：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递进式变化。而且，学龄人口变化在区域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因人口流入，适龄人口降幅相对较小，而一些地区降幅相对较大。教师培养与供给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做好规划，师范生的培养不能像乘过山车一样“大上大下”。

其次，预测教师需求和培养规模，要统筹考虑中小学班额与生师比等复杂因素。大班额与高生师比是制约教育质量水平的瓶颈因素，提升教育质量必须努力降低班额与生师比。多年来各级政府的努力与成效有目共睹，但一些地方大班额现象仍然存在。尽管适龄人口减少，2024年全国中小学大班额数量却同比增加，意外反弹。初中教育面临入学高峰排浪式冲击，大班额问题比较突出；高中教育普及面临资源压力，学位持续紧张，生师比有所扩大。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结构性和城镇寄宿制学校大班额，以及教师负荷过大等问题同时存在。教师资源配置必须同时满足教育的规模需求与提升教育质量的需求，也随学龄人口变化呈现周期性。一般来说，在学龄人口高峰教师要有序增加，不能盲目增编进人；进入学龄人口低谷，缩小班额、降低生师比有了条件与可能，教师要有一定的储备并加大教师进修培训力度。办教育必须遵循教育规律与教师队伍建设规律，在大班额仍然存在和生师比仍然较高情况下，慎言“教师超编”和“师范教育减量”。

再次，预测教师的需求和培养规模，还要考虑“提升教师学历水平计划”与“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要求。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教师学历与整体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地区长期以来代课人员比例过高等结构性问题亟待从根本上解决，吸纳更多高学历、高素质教师也越来越具备现实条件，教师的培养规模与质量水平要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

最后，预测教师的需求和培养规模，还要考虑技术环境的因素。不断有人说，教育信息化可以弥补教师编制不足，AI时代许多教师将被机器所取代。但事实上，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是人机协同的教育，人工智能淘汰的不是人，而是不会人机协同的人。也正如朱永新教授所说，人工智能不会淘汰教师，被淘汰的将是不会用人工智能的教师。不会教书的教师可能失业，而育人的教师永远稀缺。在教育领域，技术永远不能取代人。

总之，按线性思维、静态观点，人口趋势好像导致教师教育当下面临“紧缩期”。而从系统思维和动态的观点看，学龄人口减少的趋势意味着学额紧张逐步趋缓，恰恰是教师资源紧张缓解、优化教学组织、提升教育质量的有利契机，即“窗口期”。我们要抓住学龄人口变化的“窗口期”，不失时机地推进小班化改革，降低班额与生师比、改善教育教学基本条件；抓住学术劳动力与教师人才市场变化的“窗口期”，进行教师队伍的结构性调整，努力提高教师培养层次和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深化教师人事改革，严格教师职业准入，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有编不补”与“无编可补”的困境，而不是南辕北辙，压减教师编制，进一步紧缩教师资源配置。我国本科师范毕业生每年50多万、专科30多万。全国中小学教职工人数近1500万，仅按自然减员补充3%，每年至少需要补充近50万；落实教师五年进修一次的规定，至少需要增加10%的进修编制。而降低班额、改善教师配比，意味着需要增加更多教师资源。此外，还要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师资需求。今后报考教师资格证书，必须修学教师教育理论与实操课程。基于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与教师供求关系的分析预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师范教育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改革创新、调整优化，提高培养层次、提升质量水平，而不是简单一句“减量”萎缩了之。

也许有人仍然会说，这太理想化了，难以做到。的确，在学龄人口持续高涨阶段，由于资源有限，我们只能容忍或允许一定的弹性，但在学龄人口逐步趋减情况下，实现小班化、降低生师比具备了现实可能性。这一目标可以实现，也必须实现，因为这正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

（中国教育在线，2026.6）

【常春藤高校】

◆竺可桢对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引进与改造

20 世纪 20 年代末，国民政府出台系列教育法规，办学整体偏重实用技术人才，国内高校普遍混淆大学与专门学校的定位，过度细分专业、重技艺轻通识。三十年代留洋学者归国后，围绕通才、专才教育展开论战。全面抗战爆发，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深刻反思国内办学弊病，提出大学以培育救国领袖为核心，而非单纯培养技术人员。西迁途中，他以哈佛大学通识体系为蓝本搭建本土化课程；抗战胜利后，结合全球高等教育民主化浪潮深化人文通识改革，形成近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造典范。现有研究多聚焦竺可桢创办地学系、推行导师制，较少完整梳理其吸收、移植、改造哈佛通识教育的全过程。本文依托中外档案、人物史料，梳理其实践脉络，为当代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历史参照。

一、竺可桢对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接受与引进

1913—1918 年，竺可桢在哈佛文理院攻读气象学，全程接受本研贯通的通识培养，建立兼顾自由心智训练与专业科研的教育认知。1921 年，他回国在国立东南大学建成国内首个现代地学系，初次移植哈佛通识模式。

（一）竺可桢对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接受与理解

哈佛在艾略特、洛威尔时期构建成熟通识体系：课程按院系编号分级，区分全、半课程，推行分组选修，同步开设基础导论与高阶研究课。地质学以整体地球为研究对象，洛威尔推行的选课制度帮助竺可桢搭建三层地学知识架构：内层气象气候核心专业、中层地质地理分支、外层物理、科学史等通识学科。在校期间，他跨修外文、数学通识课程，覆盖哈佛四大学习组别，形成归纳主导、兼顾人文数理的综合思维。

哈佛导师制是通识落地关键，竺可桢的导师华德坚持跨学科综合研究，引导他打通地理各分支，依靠通论夯实理论、依

托研究课程深耕专业，让竺可桢充分认识到通识对塑造完整科研思维、健全人格的价值，为日后国内教育改革埋下思想根基。

（二）竺可桢对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最初引入与尝试

1920年竺可桢入职南京高师，后随学校改制进入国立东南大学。彼时地理系隶属文科，与他理想的综合地学框架不符，1921年他整合多学科设立独立地学系，全面照搬哈佛模式。课程上整合地质、气象、地理，开设面向全体大一学生的《地学通论》，按哈佛标准划分全年、半年授课课程；1928年参照蓝山气象台建成北极阁观测站，配套实践研究课程；同时依照哈佛逻辑编撰本土地学教材。

竺可桢坦言这一阶段只是全盘移植海外经验，未结合中国文化国情做调整。后他调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不再主持地学系工作，院系学科发展失衡，1930年地学系解体。这次失败让他意识到单纯照搬西方体系行不通，必须结合本土需求改造，为浙大时期的自主化改革积累重要教训。

二、竺可桢对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本土化改造与自主化探索

1936年竺可桢执掌浙大，彼时学校工农科独大、文理科薄弱，办学偏向专科院校。竺可桢立足民族救亡背景，引入哈佛通识理念并本土化重构，推动浙大转型综合研究型大学，解决课程细碎、知识割裂问题，打造兼顾品德、理性、家国担当的育人体系。

（一）从技术学院到综合性大学的转向

接管初期，浙大文理学院长期受政策挤压，文史师资匮乏、课程残缺，办学资源全部向工农应用学科倾斜。竺可桢将文理学院定为发展核心，邀约胡刚复、梅光迪等哈佛归国学者主导改革，拆分文学院、理学院，均衡增设人文、理工、农医各类学科，破除实科独大的畸形结构。

1937年浙大参照哈佛设计五类选课体系：一是公共必修，延长国文、外语学习年限，大三统一语言会考，对标哈佛外语

考核标准；二是分组必修，分文、理两大组别，要求学生四年内修本组 3 门、跨组 2 门基础课，强制跨学科学习；三是主辅系，引入选课审批制度，兼顾自由与规范；四是基础学程，增设中外通史、地学概论等通识导论；五是自由选修，放开跨系选课，给予学生 14 至 28 学分自主学习空间。整套制度兼容教育部规章与哈佛通识逻辑，完成课程框架本土化适配。

（二）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袖人才

哈佛校长艾略特的全人育人理念深刻影响竺可桢，其改革兼顾专业能力与公共服务精神，以行业领袖为培养目标。结合抗战救国需求与王阳明心学，竺可桢建立三层育人标准：品德修养为根基，健全理性为核心，报国担当为归宿，确立“求是”校训，融合哈佛求真精神与中华修身传统。1938 年西迁宜山开学典礼，他正式提出培育“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领袖人才的办学目标。

竺可桢 1937 年率先在大一推行改良版导师制，区别于教育部侧重道德训育的统一方案，浙大导师制以心智训练为核心，引导学生自主批判、独立思考。1939 年宜山办学阶段，借鉴哈佛“阅读期”，安排导师指导经典研读、时事研讨，定期检查读书日记，在战乱环境保障通识训练持续开展。

（三）通识教育本土化建构：以基础和综合为导向的课程改革

二战期间哈佛发现分散选课造成学生知识片面，将课程划分为自然科学、社科、人文艺术三大强制板块。竺可桢对比国内教育指出，国内课程过度细碎、重专业轻基础。当时教育部统一划分院、系必修课程，院系被迫开设大量细分专业课，割裂学科联系。竺可桢在不违背官方制度前提下自主优化：第一，将两年英文定为全员必修课，保障外文原著阅读能力；第二，工、农、师范类学生必须系统修习人文与自然基础课；第三，增加通识概论学分课时，前置基础课程，压缩低年级细分专业

课，构建重基础、跨领域的课程结构，缓解专业化带来的知识壁垒问题。

三、竺可桢对通识教育人文主义价值的民族化阐扬

1942 年竺可桢计划赴哈佛考察，因校务委派张其昀访美。1943—1945 年，张其昀全程跟进哈佛通识改革项目，持续书信同步最新思路。战后全球教育走向民主化，统一课程管控的弊端凸显，竺可桢主张放开高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完善本土化人文通识体系。

（一）融贯新旧，沟通文质，构建实施通识教育的学科框架

1945 年哈佛发布《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书，确立人文价值在通识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张其昀带回完整报告后，竺可桢系统研读，于 1946 年在高教会议提案，建议将通才教育写入《大学组织法》。1947 年他亲赴哈佛交流，看清国内重技术、轻人文短板，返校后大幅扩充人文社科，新建法学院、哲学系、人类学系与各类研究所，延揽文史、法学、哲学名家；同时增设医学院，均衡扶持农林、地质等基础学科，搭建文理均衡、覆盖完整的综合化学科平台，为通识教育提供学科支撑。

（二）推进“阅读经典”，增设具有广泛思想文化价值的通识课程

战后哈佛将经典阅读设为硬性通识要求，竺可桢访美购置全套《哈佛经典丛书》，在校推行中西经典共读模式。学校多方筹措资金扩充馆藏，收藏嘉业堂、玉海楼古籍，与省立图书馆共享外文图书资源。1947—1948 学年新增国学概论、中外哲学史、名著选读等人文通识课，兼顾西方人文典籍与中华传统文史，以经典教学对冲功利化办学风气，依托本土文化打造特色人文通识。

（三）创设跨学科的关联议题，阐扬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哈佛报告书提出跨议题研讨模式，打通文理解决技术至上的教育困境。浙大复员办学后，竺可桢全面推行跨学科教学：

人文课程融入民族、时政议题，理工农医增设伦理、哲学研讨模块，引导学生从多元视角看待科技与社会发展，实现融贯中西、沟通文质的育人效果，把人文精神贯穿全部教学环节。

至建国前，浙大在竺可桢十余年建设下发展为七大学院三十学系的综合大学，办学获得国际认可：1945 年被评为国内顶尖四校之一，1948 年牛津认可其毕业生免试读研，毕业生兼具专业能力与家国责任感，广受各界好评。

纵观近三十年实践，竺可桢完成从全盘移植哈佛通识、反思缺陷到自主本土化改造的完整过程。东南大学地学系的尝试让他认清照搬模式的局限；浙大时期结合战时救国需求，以本土文化重构通识目标与课程；战后顺应全球教育趋势，完善人文经典、跨学科教学体系，构建中国化通识教育范式。他的探索始终立足民族复兴使命，平衡西方教育理念与本国文化传统，为近代高校通才教育改革提供成熟实践样本，也为当下教育强国建设、一流大学通识体系优化提供重要历史参考。

（教育研究，2026.6）